

大家西学

财富二十讲

贺力平编

财富失去价值，人类追求什么

Wealth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大家西学

Wealth

财富二十讲

贺力平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F091/19

200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财富二十讲 / 贺力平编.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 12

(大家西学)

ISBN 978 - 7 - 201 - 05820 - 7

I. 财… II. 贺… III. 经济思想史—研究—西方国家 IV. F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200028 号

出品策划



网 址 <http://www.xinhua bookstore.com>

丛书主编 何怀宏

装帧设计 陆智昌

财富二十讲

编 者 贺力平

责任编辑 赵 艺

特约编辑 张 华 邹小娥

美术编辑 兰 馨

出 版 人 刘晓津

出版发行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康岳大厦 邮编: 300051)

网 址 <http://www.tjrm.com.cn>

邮 箱 tjrmchbs@public.tpt.tj.cn

总 经 销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3.25

字 数 249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1 - 05820 - 7

定 价 29.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编者序

贺力平

“财富”是一个古往今来贯穿一切人生的大事情。在西方，从古希腊开始，财富是一个被人们经久不息地反复谈论的话题，有关财富的说法特别繁多。以英语为例，“财富”（wealth）有着多个同义词或近义词，例如 treasure（财宝）、fortune（财运）、property（财产）、estate（房产）、asset（资产）、affluence（富裕）、richness（富有）等等。几乎没有一个思想家、学者、文学艺术家或散文作者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谈论财富问题。

古代宗教文献的作者们也毫不掩饰他们对财富的看法。例如，《圣经》中就有这样被广泛引述的话：“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穷人遭受白眼，连邻居也厌恶；富人处处受欢迎，朋友遍布天下”（此话相当于国内谚语“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不管是否信奉某种宗教，每一个普通人在自己心目中都有着对财富的看法，并有意或无意地让这样的财富观念去左右自己的行为。许多人在追求或不追求个人财富的时候，并不去理会财富概念的内涵，不关心个人财富行为对社会的影响，也不在乎财富增长真实源泉的问题。

但是，这样的问题却始终困扰着各个社会，而社会的问题又总是个人的问题。社会是个人的集合体，社会的命运与个人的命运总是息息相关。个人的兴亡盛衰不一定反映民族的兴亡盛衰，但民族的兴亡盛衰却每每决定了大多数个人的兴亡盛衰。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兴亡盛衰与这个社会、这个民族如何去理解财富概念可以说有着密切关系。

柏拉图是本书所选的第一位作者。他是古希腊的一位思想家和学者。他生活在城邦时代。那个时代，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人普遍追求个人财富增长。柏拉图借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之口，第一次系统地说出了对财富内涵的看法。他认为，财富就是人们从各种物品的使用中得到的满足，其满足的程度取决于人们的物品创造数量；职业分工促成了这些物品的生产，所以，职业分工是财富的源泉。同时，柏拉图也看到，一个城邦对财富的追求会引起与其他城邦的矛盾和冲突，因此，国际争端的根源是各国对财富的追求。

柏拉图是一位民主主义的思想家，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却赞成君主统治制度。在财富问题上，亚里士多德关心的是如何为城邦建立起财富管理，很有条理地探讨了现在常常被视为属于“家政学”、“财政学”的许多问题〔英语中“经济学”（economics）一词的希腊文起源或许来自亚里士多德的这些探讨〕。他同意财富来自人们的劳动创造，但又说人应当分为“主人”与“奴隶”，后者可算为前者财富之一部分。现代人无论如何接受不了亚里士多德关于奴隶制的看法，但也很流行将人力资源作为社会财富之一部分的说法。

色诺芬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后的一位古希腊哲学家。他留下许多著作，但其中一些被当代学者怀疑是“伪作”或“仿作”。在他名下的《增加雅典国之岁入的方法》用现代观点看是一篇小型经济专著，也是一部政策建议报告书。针对当时希腊多个城邦之间纷争不断的局面，色诺芬明确提出，和平是增进财富之途，因为贸易繁荣首先只能在和平的环境下发生，而财富增长离不开贸易繁荣；而且，战争不仅可能会摧毁财富，任何战争或准备战争的行为都将财富转用于它本不应该有的目的。

在古希腊的文明及后起的罗马文明因大规模战争和种族冲突而中止的漫长时期中，欧洲陷入“黑暗的中世纪”。意识形态上的禁欲主义和装模作样的神学探讨使那时的知识分子们长期回避了财富问题。但在现实生活中，伴随着商业发展和贸易兴旺，普通工商市民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个人财富的追求。作为欧洲文艺复兴潮流先驱者之一的英格兰剧作家莎士比亚在17世纪初编写了一出悲剧《雅典的泰门》，以文学形式指出了当时社会肯定业已盛行的财富拜物教观念。

这出戏剧，以古代雅典城邦假想的富有贵族泰门为主人公，叙述了这位曾经为乐施好善者的富翁在失而复得大笔财富过程中的曲折凄惨经历。莎士比亚借泰门之口说出了扭曲的财富观念如何导致个人行为的异化（人格的乖戾变化及与社会的不和谐）。《雅典的泰门》不是一篇经济学论著，但其中有关财富拜物教的言语后来被许多经济学者广泛引用，对财富问题上经济思想的进步有过明显的促进作用。

思想的解放无疑是经济生活发展的一个条件和伴随物。中世纪晚期西欧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如何看待对外贸易问题以及对外贸易与财富增长的关系。曾在当时一家大型国际贸易公司长期做高级职员的英格兰商人托马斯·孟在17世纪上半期发表了一篇小册子《英格兰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依据经济分析说明对外贸易是增进国民财富的有力手段。

托马斯·孟的许多观点在现代人看来属于“晚期重商主义”，即温和的重商主义。早期重商主义或极端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那些不出产金银的国家只能通过出口贸易来赚取金银，因此，一国只能多出口、少进口，甚至不进口。温和的重商主义者托马斯·孟不赞成一般地限制进口贸易，强调鼓励出口贸易，认为贸易顺差是一国财富增长的具体表现。尽管这个看法和主张仍不符合现代思潮，孟的论著却萌发了“国民财富”的概念，即探讨一国财富增长主要不应从皇室或统治者的角度出发，而应当从普通人民的利益出发。由托马斯·孟的论著所引起的讨论在18世纪后半叶的不列颠社会最终转向了“国民财富”问题。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思想和观念转变。后来的西欧北美社会乃至在全世界范

围内都伴随此种概念的转变而确立了争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思想。

约翰·洛克是17世纪后半期英格兰哲学家、思想家和学者，经济学不是他的专长。他生活的时代出现了舆论的开放和活跃，人们开始针对政府的政策发表公开见解。他从当时有关政府是否应当为银行信贷实行最低利率管制的争论中敏锐地看到这个问题实质关系到如何看待财富。他提出了这些重要见解：金银不等于财富；金银充当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作用，它们在一国境内的多少与该国的实物财富量没有必然的、固定不变的比例关系；人为地限制借贷利率，会阻碍金银的流动，促使人们减少正常的信贷活动，从而不利于财富的创造。洛克的这些思想对后来的经济思想家们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比洛克稍晚一些的大卫·休谟也是一位哲学家、思想家和学者。休谟主要生活在苏格兰地区（苏格兰与英格兰两个地区的皇室在18世纪初合并，并在此后称为“联合王国”，该词对应于现在汉语中常用的“英国”），但也与洛克一样，时常受到时事舆论的影响而参与现实事务的讨论。他一生除著有多本哲学和历史书籍外，还写有多篇经济问题文章。在本书所选的那篇文章中，休谟论证说，决定一国财富有多少的关键因素是人力和工业（“工业”在这里的含义可理解为企业家活动），因此，政府若真正关心国民财富的增长，就应当关爱人力和工业。休谟的主张再次将财富问题的讨论推向了平民化道路。

差不多同时，在欧洲大陆的法兰西却出现了财富问题上迥然不同的见解，这就是经济思想史上所说的“重农主义”。杜尔阁是其中一位代表人物。他在1766年发表了小册子《关于财富形成和分配的考察》，明确提出“只有农民的劳动才创造财富”。这个看法，多少有点像中国历史上常有人说的“农本商末”。不过，杜尔阁采用了许多分析推理，不单单进行价值判断。杜尔阁以及其他若干重农主义者的观点，对后来的法兰西政府——不管是拿破仑王朝帝国还是此起彼伏的几个法兰西共和国——的经济社会政策都有重要影响。

在杜尔阁上述著作发表十年后，远在苏格兰的不列颠学者亚当·斯

密发表了迄今为止仍然是经济学上最重要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本书的中文简称是《国富论》，但按其内容和精神似更应简称为《民富论》）。这是一部当时关于国民财富问题的最全面和深刻的学术巨著。斯密在这部著作中探讨的对象既不是个人财富，也不是皇室君主的财富，而是全体国民的财富增长。他的结论可以说是民主制的政治思想与经济学的理性分析相结合的一个结晶。本书从斯密的广泛论述中挑选出三个高度相关的论题：“劳动分工增进国民财富”，“资本增殖促进财富增长”，“重商主义不能增进国民财富”。

第一个论题“劳动分工增进国民财富”看上去与柏拉图的观点相同，实际上很有区别，并且是一个巨大的发展。柏拉图说的是一个人终生工作（职业）与另一个人终生工作（职业）的区别，斯密则说的是在同一个工作场所中一个劳动者与另一个劳动者的区别。换言之，柏拉图说的是个体劳动者之间的区别，斯密则说的是集体劳动中个人之间的区别。劳动分工与专业化的概念自此开始，并被此后所有经济学家们共同认为是国民财富增长的有效途径。

第二个论题“资本增殖促进财富增长”在现代人看来是一个十分寻常并且相当简单的道理，但对当时的社会来说，无异于一声震耳欲聋的惊雷。斯密之前的知识界还没有人这样来概括和提炼“资本”概念。在斯密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资本是什么——资本就是创造财富的财富”这个说法。近代工业革命在《国富论》发表后的时间中如火如荼地在不列颠社会蓬勃开展，两者的吻合显然不是偶然的。

第三个论题“重商主义不能增进国民财富”可以说给予了各种形态的重商主义观点——早期的或晚期的，极端的或温和的重商主义——以致命的打击，结束了重商主义思想对流行经济政策的主导作用（至少在当时的联合王国范围内）。

斯密之后，财富概念更加流行，“政治经济学”也确立了在知识界和学术界的显赫地位。19世纪的学者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认为，政治经济学或者说经济学就是探讨国民财富问题，即围绕国民财富的生产、流

通、分配和消费等等方面。

国民财富的重要性得到了公认，但随之而来出现了若干有争议的问题。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确定财富的价值。斯密同时认为劳动与交换都共同参与财富价值的决定，而这在后来许多人看来是对两个相互对立的说法的简单调和。

李嘉图是斯密之后一位“自学成才”的经济学者（这在那个年代是常见的事情），参与过与同时代人的许多场争论。本书选录了一段他关于财富与价值决定的文字。阅读这些材料不是很容易，但读者可以集中关注于他关于劳动创造财富的观点，并将这个观点与后一位作者——很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位系统用数学公式来表述经济学原理的法兰西学者古诺关于交换决定财富价值的观点——进行对比。古诺的写作风格显然比李嘉图容易接受多了。

在欧洲大陆的另一个地方，19 世纪上半期的德意志诸邦正在走向统一。这是一个现在看来充满动荡和纷争的年代。普通家庭出身的李斯特那时本来可进入学术生涯，但一些社会和政治事件使他一度被迫离开德意志，远渡重洋前往北美，并在那里亲眼看到保护关税政策对年轻的合众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他回到故土，发奋著述，写出了《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1）这部对后来德意志帝国经济政策有重要影响的书。在该书中，他用“集体主义”的观点重新注释了“国民财富”概念，并鼓吹通过国民共同行为来增进国民财富。他是亚当·斯密著作的勤奋研读者，但终究认为斯密的思想不适合“德意志国情”。

如果说亚当·斯密在 18 世纪下半期开创了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研究体系，那么，活跃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的马歇尔则引入了现代经济学的规范研究体系和规范教学体系。马歇尔长期执教于剑桥大学。他的代表作是《经济学原理》（1890 年初版，后来数次修订再版），完全按教科书方式编写而成。在这本书中，他肯定了经济学是研究人与财富之学问的传统看法，并试图给予财富一个从个人到民族进而到世界的包罗万象的定义。他的这种做法，反映出他想成为一个经济知识集大成者的

愿望。在很大程度上他也做到了这一点。或许正因为如此，他使后来众多模仿他方法和风格的学者都黯然失色。从另一个方面看，马歇尔的这种用意也可能反映了那时的不列颠帝国正处于兴旺顶峰以及马歇尔所在的大学及其学者们试图成为引领世界学术潮流的中心。

在马歇尔之前的19世纪和之后的20世纪，有大量经济学者在财富问题上发表过见解。我们在这里不得不忽略他们，这不完全是因为本书篇幅限制的缘故，更主要是因为希望给读者们介绍提出过独特见解的学者们。有三位学者特别适合这种选择标准。他们是美利坚学者凡勃伦，德意志学者韦伯和桑巴特。他们三人的基本观点之间有一些相似之处，各自的论述风格又都错落有致。

凡勃伦认为财富激发现代社会中的个人竞争，这种竞争本身在推动着财富增长；韦伯认为财富观念转变是资本主义的原动力，中世纪晚期在西欧社会出现的新教伦理是工业革命和经济进步的精神先声；桑巴特提出，财富增长、奢侈追求与资本主义之间有着共生关系。这些生活在不同地方的学者看来都观察到了当时社会甚至前近代社会中的奢侈消费倾向，尽管他们各自的个人生活在绝大多数时间中都是清贫的，至少不是富裕的。

与这三位学者不同的是，凯恩斯可算是享受贵族般生活方式的学者。他不仅有相当的家产（其父亲也是一位学者，同时也是一个富裕大家族的成员），而且在长期享受剑桥大学教授薪俸的同时，从各种官方兼职和社会活动中也获得可观收入。但是，在凯恩斯学术事业十分活跃的20世纪30年代，世界各国经济普遍陷于衰退和萧条之中，对世界前途的悲观情绪不仅蔓延在众多普通劳动者之中，也传染给了许多知识分子和学术人士。在这个背景下，凯恩斯提出了对世界范围内财富问题的乐观看法。他说出了当时很多人连想也不敢想的预测：财富问题在百年之内可得到完全解决。另一方面，凯恩斯也提出了以往经济学者们很少重视的看法，即人们的需求也是影响财富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凯恩斯预言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实现，部分地可通过阅读下一位作者加尔布雷斯的著作来判断。加尔布雷斯是一位美利坚学者，长期任教于

哈佛大学，并担任合众国驻印度大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期还负责过调查及评价盟军对纳粹德国大规模轰炸的经济效果。他应当是一位贫富问题两个侧面都有很多感觉的学者。1958年他发表了《丰裕社会》一书，提出美利坚合众国已经成为一个“丰裕社会”，其特征是物品供给充足，劳动者普遍有工作，越来越多的普通社会成员已摆脱贫困，进入到甚至超过我们现在用“小康”一词来描绘的境况。对此，人们也许会说，30余年前凯恩斯在联合王国提出的预言在30余年后的合众国至少得到了很高程度的实现，尽管其间还爆发过一场大规模的、持续数年的国际战争。

但加尔布雷斯想必不是一位轻浮者。他提出“丰裕社会”这个概念的用意似乎不是去演唱一曲“盛世华章”的学术颂歌，而是向那个社会的人们指出，时代有变化了，思维方式也应调整了。

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初，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有越来越多的西欧北美的南太平洋民族进入到“丰裕社会”行列。但是，几乎是突如其来的石油危机中断了这场长期景气。一些学者转向了另外的结论。在他们看来，财富问题远没有解决，“丰裕社会”的物质基础尚十分脆弱。

本书选入的作者舒马赫是这类学者的一个代表。对有志于研读经济学专业的年轻读者来说，现在不太容易看到类似材料。有鉴于此，本书给予舒马赫作品较多篇幅。

20位作者中的最后一位是哈佛大学经济史教授兰德斯。他的作品不仅不是最不重要的，而且可以说反映了财富问题研究中最近的思潮和成就，这就是高度评价知识在财富增长中的作用。这当然不是出于知识分子或学者们的自我欣赏，而是从国民财富可持续增长的新视角来总结人类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上述选文，从柏拉图到当代学者，大体上反映了西方主流思想家和学者们财富思想的演变历程。读者们从这本薄薄的文选中可以看到，西方财富思想大致经历了这么几个明显的阶段：以古希腊学者为代表的关于财富一般原因和作用的见解，从近代不列颠思想家和知识分子发轫的

有关国民财富增长源泉和前景的探讨，以及最后到当代学者们关于财富增长可持续性的新认识。这些演变既反映了思想和知识的进步，也反映了社会经济现实的发展。

如果人们要问财富究竟是什么，当代经济学者们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个普遍的共识：财富是一个人或一群人所拥有的既能带来当前消费效用又可被储蓄起来以给未来生活带来消费效用的事物；所有被储蓄起来的未来效用必须经过一定的贴现率转化为可与现在效用相比较的现在价值；财富的基本价值由人们的劳动所创造，但财富价值的表现必须通过交换过程并借助货币来体现；人类生命具有不断延续的特点，财富也具有不断延续的特点；可持续性是人类从生命延续的角度在思考财富及其增长前景时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但是，必须说明的是，本文没有将入选文章的重点放在与财富概念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上，即财富和收入分配。事实上，自 19 世纪初以来，有关财富概念的探讨一直与财富和收入分配纠缠在一起。本文选中亚当·斯密涉及“二元价值论”的论述、李嘉图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论述以及西斯蒙第关于交换价值论的论述分别都与财富和收入分配问题有关。

经济思想界有关财富和收入分配问题的争论在 19 世纪达到几乎白热化的高峰，刚刚完成工业革命并正在继续工业化的诸多国家一度到了难以维系民族统一和社会稳定的地步。正是那个时候，不少人士认识到财富问题的深刻根源和解决办法。例如，不列颠学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说，“人们并不想致富，而是想比别人更富”；法兰西学者巴师夏在其著作《经济和谐》（1850）中指出，财富分配问题的实质是如何平衡个人能力与欲望：“在孤独中我们的欲望超过我们的能力，在社会中我们的能力超过我们的欲望。”毫无疑问，19 世纪涌现出来的这些精彩思想，对 21 世纪的读者认识今日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财富及其分配问题继续有重要启示作用。

总序

何怀宏

这套丛书是我们拟议中的“观念读本”之一种。拥有语言形式的思想观念是人猿揖别的一个标志。各民族、各文明在自己的发展历程中都对丰富人类的精神宝库作出了贡献，有必要互相参照。而当世界进入“现代”之际，甚至在商品、资本的全球大规模流通之前，观念的流动其实早已开始，乃至后来引发了世界性的激荡。在这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发轫过程中，西方观念相比于其他文明的观念起了更重要的作用，而我们的母邦中国在近一百多年中也发生了包括深刻的观念变革在内的一系列变革，故而对观念的关注是以中西为主。而无论中西古今，我们都将努力从具有经典意义的著作中遴选篇章。

对人的“思想”及其产品或可分离出三个要素或过程：一是个人思想的主观过程，包括思考、判断、分析、反省等；二是已经具有某种客观化形式以至载体的概念与理论；三是成为许多人头脑中的观念。我们这里所理解的“观念”是这样一些关键词，它已经不仅是思想家处理的“概念”，而是变成社会上流行的东西，被许多人支持或反对的东西。对“概念”的处理是需要一些特殊能力或训练的，而“观念”则是人人

拥有，虽然不一定能清楚系统地表达，甚至有时不一定被自身明确地意识，比方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不管有没有或有多大的独创性。这种“观念”的源头虽然还是在“概念”或者说“思想”，但它已经不是一两个人的思想，而是千百万人的思想。这一系列读本要处理的“观念”就是这样一些共享而非独享的思想。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写道：“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者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学人。我很确信，既得利益之势力，未免被人过分夸大，实在远不如思想之逐渐侵蚀力之大。”

耐人寻味的是，一个主要研究经济或者说物质的东西之运动的学者，却对思想观念的力量给出了如此高的评价。当然，这可能是由于他生活在一个巨变时期。凯恩斯这里所说的主要是观念对个人，对哪怕是无意识地接受了某种观念的个人的影响，尤其是对政治家的影响；他还强调观念接受中的“时间”因素——观念从提出到接受可能是相当漫长的、隔代传递的一个过程。但无论如何，他看来还是倾向于思想观念支配着世界的观点。而韦伯的观点可能稍稍折中，他在《宗教与世界》中认为：“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与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由理念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常如铁道上的转辙器，决定了轨道上的方向，在这轨道上，利益的动力推动着人类的行为。”也就是说，直接的还是“利益”决定着人们的行为，但是，人们如何理解这“利益”，或者说，这轨道往什么方向去，却决定于人们的观念，尤其是人们的价值观，决定于他们认为什么是他们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他们觉得“最好”的东西，是他们认为最值得追求的东西。当然，这里对“利益”的理解就必须采取极其宽泛的观点，它不只是物质的、经济的利益，甚至也包括精神的“利益”。比方说，西方中世纪人们的主流价值观就不是追求俗世的好处，而是彼岸的“永生”。但这样一来，“利益”与“观

念”就很容易混淆而不好区分。

影响我们的行为、活动和历史的因素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自然环境，二是社会制度，三是思想文化。而每类又可再分出两种。属于自然的两种：一是人类共居的地球，二是各民族、群体所居的特定地理环境。属于制度的主要有两种：一是经济制度，包括生产、生活、交换、分配等方式；二是政治制度，包括权力运作、法律、军事等机构和活动。属于思想的两种：一是比较稳定外化，为一个群体共有的文化、风俗、心灵习性；二是比较个人化，经常处在争论和辩驳之中的思想、观念、主义和理论。那么，这三类，或者更往细说，这六种哪一个对人类的生活和历史具有更重大的影响？或按习用的话来说，是地球或者地理环境，还是经济或者政治，抑或人们的心态或者思想更具有“决定性”？

“地球决定论”一般不会进入我们的视野，除非整个地球家园面临灾难乃至可能的毁灭，但我们在今天一些生态哲学中已经依稀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思想。一些面向人类比较广阔和长远的文明和民族观察和思考的人们；也曾提出过“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思想。而在一个以经济为活动主轴的时代，比较盛行的是“经济决定论”的思想。“政治”乃至“军事决定论”则往往在传统书写的历史中占据主导。在一个激烈变化的时期，则不时还有“文化”或“国民性决定论”以至“思想观念的决定论”出现。但今天，我们也许应当首先审慎地思考“决定”这一概念本身，因为“决定”的含义本身就难以“决定”。也许一切都有赖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以及对历史范围、时段、条件的规定。

人们只有吃饭才能生存，才能从事其他活动，这诚然是颠扑不破的道理，但由此引出经济是决定性的结论却必须放到某些条件下才有效。从更为基本和长远的观点看，地球千百万年来决定着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可能性，地理环境则构成对一个民族的活动，包括经济活动的很难逾越的制约。人们如何生存、如何找饭吃要受这些基本条件的限制。而从更高的观点或者虽然较短但却可能更为关键的时段看，吃饭并不是一切。政治常常是更直接、更有力，并有它自己的逻辑杠杆。而文化风俗

和国民性常常造成一种政治经济改革的“路径依赖”，至于观念，则无时无刻不在历史活动的主体——人那里发生作用，尤其重要的是，它们往往在某些“转折”或“革命”时期起着关键的作用。如对于美国革命，白修德甚至认为，美国是由一个观念产生的国家，不是这个地方，而是这个观念缔造了美国政府，这个观念就是《独立宣言》中所揭示的平等、自由以及每个人追求自己所认为的幸福的权利。而拿破仑也谈到，法国大革命是18世纪启蒙观念的结果。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说观念起了巨大的作用时，并不是说它起的都是好作用，或者说起了作用的概念都是正确的。推介《进步的概念》一书的比尔德说：“世界在很大程度上由观念支配，既有正确的观念，也有错误的观念。英国的一位智者断言，观念对人类生活所具有的支配力量，与其中的错误程度恰好成正比。”而吊诡的是，过度引申和扩张的单线“进步观念”可能也恰好在某种程度上属于这样的观念：它最真实的成分往往不那么引人注意乃至显得无力，而它最有力的部分却是不那么正确或周全的。

总之，我们不想夸大观念的力量，但它们的确还是起了巨大的作用，尤其在某些巨变的时期：这时其他条件都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变，但由于人们的想法变了，也就酿成了社会巨变，虽然这里也可以进一步追溯说人们的想法改变是其他条件变化累积的结果。不过，对学者和思想者来说，可能还是会更为关注思想观念，就像剑桥大学历史系教授阿克顿1895年在其就职演说中所说：“我们的职责是关注和指导观念的运动，观念不是公共事件的结果而是其原因。”但知识者自然也得常常警惕这种对思想观念的偏爱，警惕自己不要逾越某些界限。观念不仅在接受的个人那里常常是滞后的，而且它的社会结果是滞后的，对观念及其后果的认识也是滞后的。我们往往要通过一个观念的后果才能比较清楚地认识这个观念。而除了时间的“中介”，我们还需注意作为人的“中介”，观念往往是通过少数，尤其是行动的少数而对多数人发生作用。企望由自身在当代即实现某种理想观念的“观念人”往往要在实践中碰壁。

所以，在这一系列观念的读本中，我们将特别注重时间、时段，注重历史。我们将试图回顾。柏拉图说一个人的“学习即回忆”，而一个民族的学习大概要更多地来自回顾，这种回顾也似乎更有可能，更有意义，也更容易着手。但我们将立足于现在来回顾，甚至于关照未来进行回顾。我们是在一个历史的巨变时期之后——但也可能还是在这之中——来回顾。的确，我们只是从一个侧面，即从观念的历史来回顾。但我们也意识到观念在一个历史巨变时期的特殊重要的力量。

这套丛书就是这样一种试图从观念回顾历史的初步尝试。现在放在大家面前的这些观念，诸如科学、民主、平等、自由……是一些曾经感动或激荡过远远不止一个民族的声音和文字。对于中国来说也许更是如此，它们有些在这片古老辽阔的大地上掀起过风暴，有些则是一直在对众多的人发生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影响。的确，这些观念的来源虽然可以追溯到久远，其思想萌芽或雏形也可以在几乎所有民族和文明中发现，其意义有待于各民族和文明去补充、修正乃至更改和替代。但是，就像“现代性”是从西方发源一样，本丛书选择的这些颇具现代意义的观念，主要还是西方的产品，或者西方人对之有过特别的解释。

自19世纪上半叶与西方大规模接触和冲撞以来，中国对西方开始还是只注意西人之“利器”和“长技”，继则更注意制度，最后则相当强调观念与思想理论。20世纪初，尤其是1905年废除科举、知识人失去体制依托之后，更是纷纷奔赴国外寻求救国的新知和自己的新出路，哪怕一时不容易去大洋相隔的西洋，也赶到一衣带水的东瀛，故中国人接触的许多西方观念都是通过“日译”的转手。目前我们所使用的大部分西方观念都是先通过“日译”，后来则是通过不仅涉及名称、更涉及思想内容的“俄译”。“日译”提供其名，“俄译”提供其实，“日译”阶段尚称多元，“俄译”阶段已趋一元。作为我们先辈的阅读和翻译者常常不仅坐而言，而且起而行，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动员他人和大众力行。

“五四”时期，最著名的“观念先生”当推“德先生”（民主，Democracy）、“赛先生”（科学，Science）两位。很快这些观念又被“革